

論 索 引

—— 紅樓夢人物索引序 ——

1-2.

周 策 縱

威斯康辛大學東亞語文學系

潘銘榮博士編撰「紅樓夢人物索引」一書，對紅學家和一般愛好「紅樓夢」的人，真是一大喜訊。這樣的工具書應該早就有了。大家都知道，「紅樓夢」研究，在最近六十年間，可說比任何其他一部中文書都繁榮而更引起研究者和讀者真正的興趣。可是非常奇怪，我們一直就沒有一部詳盡的「紅樓夢」索引（倒是「索隱」却不少了！）。就我個人來說，對這件事已提倡了三十多年，也始終未能完成。五十年代初期我曾草擬了一份「紅樓夢」研究大綱，對作者、編者、和小說本身，定出了相當全面詳細的研究計畫，其中就包括要作索引。六十年代初期，威斯康辛大學有幾個學生答應協助我做，只完成了各譯本方面的人名對照表等，但全部工作後來因別的事故而未能進行。當時還計畫用電腦來做，但未能得到資助而作罷。1971年1月經過香港，恰逢中文大學舉辦「紅樓夢」研究展覽，約我講演，我又乘機提出幾點建議，其中有一點就是：「對『紅樓夢』中人物的名稱，及其他專有與普通名詞語句，作索引和研究。」（講辭登在1971年11月份的「紅樓夢研究專刊」第九輯）以後到了1973年纔見有日本宮田一郎先生的「紅樓夢語彙索引」和1976年底林語堂先生的「紅樓夢人名索引」，但都不夠完備。這件小事足以說明，我們對於研究的基本工具書太沒人注意和努力，使幾十年來不知浪費了多少精力和時間去查檢與記憶。所以銘榮此書的出版，我個人也就特別感到高興。

大家都知道，近代歐、美學術與出版界的索引工作做得非常完備。他們在這方面有長遠的傳統，而且在電腦發展的今天，不斷求改進和推廣。個別書稿按字母次序排列的專題（subject）與語句索引，也許可能追索到第八世紀，如：達瑪司卡斯的聖約翰（St. John of Damascus）所著「聖經與早期教會作者專題索引」（Sacra Parallela）和歐賓羅的巴梭羅穆（Bartholomew of Urbino）所著「奧古斯丁與安布羅斯名言選索」（Milleloquia）（of Au-

gustine and Ambrose），便是其例。不過有些人還不認定這些完全合於索引的條件，而以為最早的索引書也許是十三世紀聖丘休（Hugh of St. Cher）所編的「聖經通檢」（Concordance of the Bible, 1247）。也有人認為應該要到十四世紀或十六世紀纔有正式的索引。至於給比一書更多的資料作索引則要到十九世紀自然科學資料書纔開始。但1878年（當中國清光緒4年）倫敦却首次成立了引得學會（The Index Society），並出版學會秘書亨利·惠特萊（Henry B. Wheatley）所著一冊96頁的小書「何謂引得」（What Is an Index?），敘述索引的發展史和編製原則與辦法，並列有書目等；可是本書後面卻沒附索引。最近數十年來，西洋研討索引問題的書文更是不少，美國各大出版社也多自己編有簡要實用的索引指南，要求並幫助作者在校對書稿後自編索引。我嘗鼓吹，中國的出版社應該也採用這種辦法。

談到在現代中國提倡大規模編印索引，當然要算是從1930年起洪煥蓮（業）先生所主持而由美國資助的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為起始。二十年間出版了中國經典著作的索引書不下60餘種，功績顯著。後來北平中法漢學研究所和隨後法國巴黎大學、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以至於美國亞洲學會在臺北設立的中文研究資料中心，相繼努力，各有成就。洪先生並於1932年著有「引得說」一書，凡69頁，後附本書引得，對何謂引得，中國過去的索引書，以及引得編纂法等多有說明。可惜我上面所提到的那些資料和史實，洪先生當時似乎未曾見到。他把英文index一字音義雙關地中譯為「引得」，很是巧妙；並介紹把書中每個字都索引的 concordance 音譯為「堪靠燈」。我嘗建議不如就用「通檢」一詞。可是中法漢學研究所出版的「通檢」其實多只是選索性的「引得」，並非每個字都可檢索到；而哈佛燕京學社編印的「引得」反而不是選字的通常西方所謂的「引得」，而是字字可索得的「

堪靠燈」。名實頗為混淆。我看不如把「索引」一詞作普通檢索動詞用，或作不區別檢索多少的一般名詞用。把「引得」只用來指選字選詞的索引；凡每個字都可索引到的才叫做「通檢」或「全索」，也就是洪先生所譯的「堪靠燈」。這樣說來，「紅樓夢」人名或語彙的索引，就都應該叫做「引得」。

談到中國索引書的發展史，可能也不見得比西洋晚，不過發展的趨向與功用有點差別。索引書的性質應該是依文字的固定排列次序（而不是依分類次序）安排名詞、語彙、或主題，或合此二三者一起，以便於檢索其來源的工具。中國的類書多是按主題或詞語的意義與性質分類排列，只能算是百科全書之一種。惟明永樂元年至五年（1403—1407）間所編的「永樂大典」是依首字韻序排列，可算有索引性的類書。至於韻書，雖是依字的音序排列，偶註定義，但只為解釋那單字的本身，無索源之用，故只能算做一種字典。（西洋一般的百科全書固是按字母排列主題或詞語，但只有一部分索源之用，大部分在解說詞義或主題，所以也不同於正規的索引。）其他傳統中國著作中，凡把名詞、語彙、或（和）主題依首字音韻次序排列，而便於檢索其資料來源或所在之處的，應該可算作索引，至少在廣義上可這麼說。第八世紀時，唐代顏真卿（709—785）編有「韻海鏡源」16卷，「四庫提要」說此書「為以韻隸事之祖，然其書不傳。」清黃奭輯佚收在「漢學堂叢書」內。原著如標注事之資源，則可能有索引書的性質。南宋吳澄（1249—1333）「支言集」提到張壽翁著有「事韻攝英」，可能與顏書類似。其後宋、元之間，十三世紀中下期，陰時夫編著「韻府羣玉」。明朝有「五車韻瑞」，而清朝張玉書等奉康熙皇帝命編的「佩文韻府」，最初出版於康熙50年（1711），大致上可供檢句出處之用。至於嘉慶3年（1798）出版的阮元等所著「經籍纂詁」，性質固類似於「牛津英文大字典」，但亦有檢索經籍字句出處的功用。這些都可說大部分性質是索引書。在另一方面，明朝於嘉靖35年（1556）成進士的凌迪知曾編著有「萬姓統譜」，清朝乾、嘉時代汪輝祖（1730—1807）也編著有「史姓韻編」和「九史同姓名錄」，這些便都完全是索引的工具書了。

不過以上所有的這些中國著作，都不是供檢索單獨一種書用的。單索一書的似乎一直要到民國11年（1922）蔡廷幹（1861—1935）編刊「老解老」才開始。這是對「老子」一書的通檢或全索，前印武英殿聚珍版「道德經」全文，後印索引，每個字都可檢索到。蔡氏是1873年清廷第二批派到美國留學的幼童之一，在美讀中學，畢業後又在

機器廠工作，1881年回國後入海軍，甲午中、日戰爭時指揮魚雷艇，民初在北洋政府中任海軍上將級顧問，稅務處會辦、督辦、及外交總長等職。此書似係其任稅務會辦時所作，大約曾受到美國或日本的影響。正如洪煥蓮先生已指出過，日本森木角藏已於大正10年（1921）由經書索引刊行所出版了「四書索引」，前有四書白文，也是全索。比蔡書早了一年。而且蔡氏的「老解老」一書是自刊非賣品，很少人見到。

從上面這些史實看來，中國索引的發展與西洋相反，先有索諸書之事的索引，後來才有專索一書的工具書；西洋却是先有特索專書及少數著作的引得，後來才有普索多種資源的索引。傳統中國索引書不够發達，一方面當由於不用字母，依韻檢字不易；另一方面大約也由於過去認為凡「讀」一書就得「成誦」，應該背誦記住了，多用索引便是偷懶。清末學者譏諷前人不讀書而只依賴「經籍纂詁」，一部分就是這種心理表現。難怪單一書的索引不能盛行。

這裏我把中外的資料索引說了這麼多，實際上是希望藉這「紅樓夢」的索引來促使中國學術界和出版界注意，我們的經典和重要著作，都應該有引得或全索；而每一種新舊學術性著作的書後，也都應附有引得；好的中文出版社應該以此為定規，凡出一書，後必附索引。索引也是一門學問，如何做索引，也不可輕視忽略。這在近代學問裏是訊息檢索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部門。這件事對我們社會上知識的傳播與開發實在是頗關緊要的。

至於有關「紅樓夢」的索引，當然還不止於人名和語彙。地名和其他專名，以至於官銜、職業、衣飾、鳥獸、花木等一般名物，都應有索引；主題、觀念、思想、活動等也應有索引。而這些主題與觀念等如何抉擇，很可引導讀者和研究者的注意點和方向，尤其不可不客觀、精細而慎重。其他版本，如甲戌、有正、夢稿、程甲、乙本，以至於更完備的彙校本，也應分別連校注作出引得。有些人地物名出現次數很多者，後面不但要標注章回數和頁數，而且各頁數前還應分別簡單標明與何人、何地、或何事相關，這樣纔可使讀者在一連串頁碼中一看就知道要向那一頁去查閱。

潘銘榮博士做學問很重條理，又很勤奮。我相信這人物索引只不過是一個開始，以後他一定還會不斷改進，供給我們對「紅樓夢」和其他著作更多的工具書。這種殷切的期望纔使我答應他來寫了這篇囉唆的序言。（潘氏此書將由香港龍門書店出版）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於陌地生威斯康辛大學